

买办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兴起

□ 蒋道霞

提起买办,传统观点认为他们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工具。诚然,买办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过程中出现的,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买办曾是西方国家在华进行经济活动的桥梁,同时买办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他们从最初替外国商人收购土产、推销洋货,到洋商企业的附股者,继而将买办资本投向中国近代工业,独立创办新式企业,使得西方新式企业制度得以移植中国,催生了一批中国近代企业,加速了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近代新式企业制度是伴随着西方列强侵略活动而进入中国的。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其中不少采取了比较先进的工厂制和公司制企业形式,这些西方新式企业依照各自国家的商事习惯和法律规范设立运行。从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起,英国的股份有限公司条例,也普遍地适用于它在中国的航运公司。这些西方新式企业,尤其是其中的公司制企业,完全是按照西方本土的企业制度模式成立并运作的,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规的调整、制定,不断地规范企业的运行方式。

买办是随着西方列强侵略活动和对华经济贸易的不断扩大而兴起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实行垄断性的公行制度,买办为来华贸易的外商采买物品、管理杂务,这些买办是为外商服务的仆役头目,受到政府和公行的严格控制。1844年的《望厦条约》规定,外商“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均属事所必需,例所不禁,应各听其便”,“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随着行商制度的废除,买办开始适应洋行扩大贸易的要求和交易方式的变化,由管理行务、经管钱财,进而兼及洋行生意的经营,包括商品的推销、合同的签订、深入内地收购各种土产品,以及报关、纳税、运输等事项,买办由仆役头目演变为洋行贸易的代理人,从洋行雇佣的管理内部事务的管家演变为代理洋行业务的买办商人。随着清政府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展,通商口岸不断增加,租界范围不断扩大,中外贸易也持续增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

中国的经济渗透活动呈不断扩展趋势,所有这些因素,都为媒介中西贸易的新式买办商人阶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买办人数方面来看,“1854年,中国大约有250个大买办;1870年,中国有550家外国洋行,约有350个大买办。到19世纪末,中国可能有10000个以上的买办,另外10000个左右有过买办经历的人还未计在内。”可见,随着外国对华经济侵略的逐步扩大和外国在华企业的日益增多,买办阶层的队伍日益扩大。

近代西方公司制度进入中国之后,通过怎样的途径影响中国人自身创办公司企业,这中间有一个过渡环节,这一过渡环节就是外商公司和外商公司中的华人附股。买办对外商企业的附股活动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最典型的是唐廷枢,上海英商的华海、北清、公正三家轮船公司中,唐廷枢都拥有大量股本。“华海公司的930华股中由唐集股的有700股;北清公司中唐是华股的领袖和代理人;公正公司中唐是该公司的董事。”著名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从1861年开始集股,不到一年便集股100万两白银,而其中买办商人资本竟占六七十万两。”“买办唐廷枢仅在1881~1882年期间所附股的外商企业就至少有烟台扩丝局、上海荣泰驳船行、上海申光公司等。”总之,买办投资于新式企业是从附股于在华外资企业开始的,外商公司以及外商公司中的华人附股直接、间接的影响和示范效应,对于国人以公司组织形式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刺激。早期外商公司的成功经营以及华人附股不仅让国人看到,而且亲身感受到了西方公司制度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并且“华商附股外资企业使华商积累了资金、技术、企业管理经验,造就了一批颇有作为的企业家。”

二

买办之所以能够积极投资中国近代企业,首先是他们在为洋行服务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成为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在此过程中他们还熟悉了洋行工商企业的管理体系、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掌握了一些洋行工商企业的营销策略,尤其是对新式企业的“市利百倍”深有体会。正是这两

个条件使他们成为了最早投资于中国新式企业的一批中国人,他们投资的这批新式企业也成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开端。

19世纪的中国近代企业往往面临着那些典型的不发达经济或前近代化经济的一个问题,即由于资本的相对匮乏和借款的利息高昂(60年代上海的商业短期贷款的年利率高达10%~16%),因此要搞到长期投资的资金是极为困难的。而买办通过同外商的长期往来,已拥巨额资金。

买办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以下途径:代理买卖的佣金收入,自营商业的利润收入,周转资金的利息收入和商品货价的差额收入。买办商人最初的财富积累主要来源于佣金,最初买办的佣金率,一般为2%,其后由于竞争,佣金趋于下降。尽管佣金率总的趋势是逐步下降,但由于中外贸易的增长,买办商人代理买卖的佣金收入仍是十分可观的。自营商业的利润收入是买办商人财富的重要来源,“买办之所以有利可图,这是由于他不仅是洋行的雇佣者,同时又是自营生意的商人;不仅是货物的经纪人,同时又是货主;不仅赚取工资和佣金,同时又赚取远远超过工资和佣金的商业利润。”晚清广东籍著名买办人物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人在担任买办期间,广泛开展自营商业活动,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开设钱庄,与人合伙开设茶栈,经营棉花出口业务,经营食盐等。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先后创办绍祥字号、润立生茶号、宝源丝茶土号,兼营丝、茶、鸦片,包办洋行生意,成为巨富。买办还投资于钱庄,从钱庄与外国银行、洋行的资金周转上,通过为外商积累资本的方式来积累自己的资本;洋行普遍在钱庄有存款,买办常用钱庄的庄票作为支付手段供给洋行或中国商人,在庄票期限内硬通货在钱庄的利息则被买办赚取了。买办还利用商品货价差额获取厚利。买办在为洋行收购农副产品时,利用各种机会压低收购价或高报价,从中赚取货价差额。利用各种陋规和暗做手脚而取得的额外收入,也是买办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买办,在较短时期内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这笔财富究竟有多大?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资料。黄逸峰估计,“1840~1894年间,买办收入约为4亿两。”王水估计,“1840~1894年间,买办的职业所得为5亿两。”汪熙则认为,“1868~1936年,买办收入约有15.29亿美元。”不论他们估计的数目是否准确,但都说明买办的收入是颇丰厚的,足以投资新式企业之用。

买办之所以能够将其积累的巨额资金投入创办中国近代化企业之中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买办作为最早同西方人进行直接而广泛接触的中国人之一,首先看到了近代工业的利益和前途。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其它阶层几乎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认识。这倒不是买办对传统行业感到失望,而是他们知道现代企业是趋势。他们在与外部世界频繁接触的过程中,不仅学会了追求最大利润的原则,还学到了新型的商业经营管理知识,逐步学会了办近代企业的新技术。这种独具的专长乃是无价之宝,这是其它社会阶层不大可能得到的。同时,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买办逐渐具备敢于承担风险的气质和竞争的意识与魄力,具备了开拓、进取的近代实业家精神,因而能够在其它阶层尚未萌动之前,他们就率先投资中国新式企业,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

活动的先行者和带动者,充当了中国传统产业结构向近代化产业结构转型的桥梁。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缓慢,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缺乏企业家精神。但是买办作为一个资金提供者、精明强干的管理者、风险承担者和革新者,凭他们的才能,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业家。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买办都是企业家(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那些小洋行的买办,他们通常只是小掮客),中国早期工业中的企业家也不一定都有买办经历(出身买办的近代企业家的精确比例是很难计算的)。但是,鉴于传统商人很少参与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并且二十世纪以前,海外华侨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因此买办的企业家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了。

三

买办商人最先投资于中国近代新式企业是因为他们最先接触到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并亲自感受到了这种企业制度模式的优势,享受到了入股式企业的经济好处。这样他们就模仿借鉴洋行企业的组织方式,自行创办新式企业,仿效西方资本家的经营方式,建立中国人自己发起的近代新式企业,并且“买办以商本形式投资官督商办企业,或以股份公司形式集聚社会资金投向新式企业,有助于中国经济近代化。”

然而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其它方面的环境都不允许建立完全为商人拥有和经营的大型企业,于是官督商办的办法便成为一种权宜之计,尤其适合于在这种环境下所作的工业化努力。

买办最初投资的中国企业是洋务派开办的近代企业,协助晚清开明官僚搞起了洋务运动,他们和一部分开明的官员合在一起,率先将西方先进的工商制度引入中国,并采用了股份制来经营和管理。洋务运动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敌、挽回利权,有利于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但实际上,洋务运动不仅在资金、技术上需要依赖先近代化国家,而且在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上也要依靠外资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例如,洋务派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创设之初,以浙沪富商朱其昂为总办,他既不熟悉对外贸易,又缺乏经管轮船航运的经验,在招商局造成管理不善、用人过滥、浪费严重,致使中国第一家航运公司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轮船招商局罗致多年从事买办职业的唐廷枢、徐润入局,唐、徐的买办生涯,不仅使他们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为他们投资近代企业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取得了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丰富知识和实际经验。唐廷枢入招商局,首先将自己担任买办和经商所得作为投资带入招商局,并将委托外商经营的“南询”、“洞庭”、“水宁”、“满族”等号轮船随带入局。在第一期招股中,唐廷枢至少投资8万两,徐润投资前后总计达48万两。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招商局呈现一片勃勃生机,从1878~1879年利润达869210两,到1883年轮船招商局的资本达200万两。

同时,洋务派创办的所有企业都有买办的功劳。李鸿章于1865年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起,到甲午战争洋务运动失败,共创办大小军用企业24个,民用工业企业20多个,这些洋务派创办的所有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都是经过买办亲手创立的或者

是由买办协助创立的。可以说,买办帮助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本身是洋务活动最重要的部分,洋务派是创立近代工业的决策者,而买办则是直接的经营管理者,买办在帮助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把西方新式企业制度移植到中国:例如,唐廷枢把自己所拥有的国际经济知识、业务经验、技术水准等运用于现代企业,把“公司制”、“股份制”、“保险制”等现代企业的运作模式引进现代企业管理,把拥有先进技术和现代思想的人才引进轮船招商局。“唐、徐制定并实施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股份制企业的章程,其在招股集资、经营管理、盈利及分配等方式上已具备近代资本主义股份制的特征。”成功地创办了中国近代首批大型的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为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兴起创下了一个良好开端。

买办在官督商办企业中获得一定的经营管理权后,以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影响这些企业,推动这些企业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摧残和洋务派官僚的腐败,官督商办企业的失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是越来越明显的了。官督商办企业失败的教训,促使许多买办走上了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道路,不久即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私人资本创办股份制企业的热潮。

当时在买办界有很大影响的唐廷枢、徐润等买办对推动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当时中国各个行业出现的首批私人股份公司大多都是由买办或买办商人投资兴办的。在保险业方面,唐廷枢、徐润在1876年和1878年先后创办了仁和保险公司和济和保险公司,后来又合并成仁济和保险公司。这几个保险公司主要是买办和买办商人的投资。新闻业方面,“在1874年前宝顺洋行买办容闳发起创办《汇报》,集股万两,投资者多为粤人,唐廷枢协助成之。”印刷业方面,“1882年徐润附股支援其徒弟秋哇宏甫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在造纸业方面,如“中国第一家造纸厂和上海机器造纸总局的主持人是禅臣洋行的买办曹子俊、曹子伪兄弟,郑观应也入股该局。”采矿业方面,“汉口宝和洋行的买办杨德1877年创办池州煤矿,唐、徐也有相当投资。1883年买办李文耀创办了第一家银矿(热河承德府三山银矿),并吸收了不少买办资本。”上海第一家华商丝厂“公和永”是由一个和洋行关系密切的湖州丝商黄宗宪创办的,其资本来源于一批从事生丝出口贸易的买办和买办化商人。不仅如此,唐廷枢还试图在对外贸易和银行领域建立跨国股份公司。1876年唐廷枢倡议“开设一生意公司,以图与英国通商”。公司取名“宏远”,计资本30万两,每股1000两,分300股份,总行设在上海,并在伦敦、香港、福州设分行,日后打算在美国纽约设分行,其资本一半汇至伦敦,一半留在中国。公司业务除经营一般商业及代理生意外,还计划充当中国政府在海外的代理人,政府需要的武器、舰只和机器,都可由他们代买。为了辅助宏远公司的业务,1876年唐廷枢与丁日昌发起,“拟由中国纠集股份,设一大银行”,该行将在伦敦、日本和其它地方设立分行。“当时一些广东商人已认购几乎全部所需资本,总共是30万两。”可惜的是,这两项庞大的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廷枢等买办卓远的经济

眼光,他们总是走在中国商人的前面。

19世纪70年代以前买办感兴趣的是在外国洋行投资(如陈竹坪和顾丰盛),或者是在官督商办企业投资(如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而年轻一辈的买办的投资方式则是在洋人和中国官员之间开一条路。这些后辈逐渐转向以私人的、独立的方式管理业务,因为他们太富有了,不愿依然在资金上仰息于洋行,他们也鄙夷官吏的管理和干预。祝大椿、吴懋鼎、朱志尧和虞洽卿受到清政府的鼓励,在八十年代以后,集投资者和管理者于一身的买办逐步地建立并成功地管理了自己的企业。据统计,1878~1913年,有110家企业是由祝大椿等13位最有名的买办发起和投资的。

买办在在投资和管理中国近代企业过程中,率先采用了西方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他们所经营的近代企业通常都装备了最时新的西方机器。买办相信,“对西方方法的全面把握”将使中国从中得益,因而他们渴求学习最新的技术和思想。唐廷枢在经营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时,“纯用西法经理”;郑观应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大胆地聘用美国人丹科(A·D. Aanforth)为总技师,主持购机建厂事宜,丹科对中国原棉进行科学的试验,根据中国棉花纤维较短的特点,让美国厂家对纱机进行专门改进,使其更适于中国原料;郑观应还较早地派人去美国学习棉花的种植和加工;祝大椿的源昌丝厂的机器装备是由怡和洋行代办的著名的伦敦推司公司的最新产品;公益纱厂的装备是由怡和洋行代办的伦敦推司公司最好的机器。唐、徐、郑等人都是富有经营新式企业经验的精明强干的人才,他们对于企业的筹备、工程的设计、设备的引进、企业的经营等都能够基本上做到按资本主义生产或管理方式办事。

从第一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开始,买办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新型观念和办工业的实效很快影响了其它阶层,中国的民族工业继而而起,买办自身也在兴办民族近代工业的过程中重塑自我,他们中不少人逐渐脱离买办身份,转化为完全的民族资本家。无论是早期独领风骚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还是后期的祝大椿、刘鸿生、虞洽卿等,都是出自买办的中国近代史上久负盛名的大实业家。买办投资于中国近代新式企业,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不管他们动机如何,买办通过投资于中国近代新式企业,引进先进生产方式和技术,不论是洋务企业还是独立投资建厂开矿,都在客观上促进了本国生产方式的转变,使中国原有的以农为本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始缓慢地向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过渡,从而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买办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和推动者,那种立足中国锐意改革的世界意识,那种勇于实践、开创新风的精神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